**论人道主义思想《双城记》中的表现**

　　摘要：《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揭露了封建贵族的恶行。作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狄更斯看到了社会矛盾，也非常希望广大人民能够摆脱压迫，但是他反对暴力革命，把希望寄托于开明统治者进行～些改革。同时他也认识到法国人民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这反映了他思想的矛盾性。狄更斯的人道主义，不仅仅局限于理论道德的范畴，还是他用来批判社会黑暗现实的武器。

　　关键诃：狄更斯；法国大革命；人道主义；矛盾性

　　Abstrat：i出theFrenhrevlutinas山ebakgrund．ATalefTitiesrevealstheevilsfthefeudalarist．eratsfrthepintfvieftl1eburgeishuanitarianis．Asaburgeishuanist．DikensaSaarefthes．ialntraditinanddesiresthenpepletgetaayfrppressin，butheasagainstvilentrevlutin。ishingseftheenlightenedrulersuldrefr．Atthesaetie，herealizedthattherevlutin，hihaSthetendenyfhistry，aSinevitable．Itrefletedthentraditininhisthughts．Ntliitedttheategryfrali—ty，Dikenshuanitarianisalsashiseapntaniadvertnthedarknessfthereality．

　　Keyrds：Dikens；Frenhrevlutin；huanitarianis；ntraditin《双城记》发表于1859年，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也是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众所周知，狄更斯是19世纪小说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同莎士比亚一样是语言风格最通俗的作家，又是在根本意义上最懂艺术的大师。马克思称赞他是“时代的旗帜”。萨克雷认为他是具备其他小说家不具备的“神奇、美妙、新鲜、迷人的品质”。他的《双城记》结构缜密，语言严谨、精确，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双城记》的创作过程是与英国当时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由于英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英国工人阶级在19世纪3年代掀起了伟大的“宪章运动”。40年代末，这场运动被反动派镇压下去。50年代，[找文章还是到☆文☆秘☆家☆园☆网，更多原创！注：去掉中间符号在百度搜索第一个网站]英国工商业一度出现了繁荣局面，但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加深。1859年的经济危机更增加了工农群众对现实的不满。狄更斯痛恨骑在人民头上的极端反动的官僚们，深切地同情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人民，并对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他熟读了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人民群众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社会承认而进行的一场斗争。⋯⋯人民起来斗争，目的就是要推翻这样一种压迫制度：它藐视人的一切天性、体面和天赋的权利，它有意使人堕落，它把人训练成恶魔一样。”由此可见，狄更斯一方面同情受苦的人民，～方面叉害怕革命；他希望通过改良的方法缓和阶级矛盾，这是他写《双城记》的思想动机。在《双城记》中，狄更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真诚地同情劳动人民所受的苦难，愤怒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的恶行，他笔下的乡村是一个萧条的地方，而贫困的原因不是土地的贫瘠，更不是农民的懒惰，而是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封建贵族用各种苛捐杂税榨取农民的血汗。作者愤慨地说：“倘使有一村不被鲸吞的精光，那到是怪事。”不仅农村如此，城市的居民也过着同样悲惨的生活。而当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那些贵族老爷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作者通过对比，说明了人民饥饿贫困的原因正是贵族的压榨，而这又必然激起人民的仇恨和反抗。狄更斯不仅描写了贵族地主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的压迫，而且揭露了贵族对人民欺凌的种种罪行。他曾对一个美国奴隶主说过：“残忍和专权的凌辱是人性的两大病症。”在这部小说里，他似乎有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埃弗瑞蒙德侯爵是一个极端荒淫之徒。他为了抢到德伐日太太美丽的姐姐，不惜将她的丈夫折磨致死。而后将她的弟弟刺死，这位年轻的少妇不堪凌辱而死。马奈特医生目睹了这家人家破人亡的过程，愤然写信向朝廷大臣控诉，但被埃弗瑞蒙德发现。于是医生被关进了巴士底狱整整十八年，出来时已是一具白发苍苍，形容枯槁的活尸，一架只会埋头做鞋的机器，完全诞失了理智和感情。这说明封建专制所施之于入的远非皮肉筋骨之苦。狄更斯从比较深的层次一心理和精神层次揭示了封建压迫对人性的残害。由此可见狄更斯关心人民疾苦，痛恨剥削压迫的人道主义思想。#p#分页标题#e#在《双城记》中，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作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看到了社会矛盾，也非常希望广大人民能够摆脱压迫，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反对暴力革命，把希望寄托于开明统治者进行一些改革。同时他也认识到法国人民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是正义的，所以对于革命，狄更斯的态度是矛盾的。1848年2月，当他得知法国人民发动武装起义并推翻了七月王朝时，写下了“法兰西的光荣万岁!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打倒王权!打倒波旁分子!打倒基佐!处死叛徒!让我们的血为自由、正义和人民的事业而流。”然而当革命风暴进一步发展时，他却保持沉默了。原因是他在日益扩大的革命斗争面前有些惊惶失措。同样，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这样，从《双城记》中的一系列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态度的转变。他所描写的1789年法国人民攻打巴士底狱的斗争场面是可歌可泣的。他热情歌颂了一举摧毁顽固封建堡垒的伟大人民。随着革命的一步步深入，特别是1792年，群众革命运动进入高潮，暴怒的人民群众进一步向贵族阶级讨还血债。后来连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愈来愈猛烈的革命风暴吓坏的狄更斯，他对革命群众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态度改变了。他把法国群众看作是“可怕的魔法所招引的”，把革命者描写成杀人成性的刽子手、吃人鬼，他们狂奔在一面红旗下，变为野人了。作者这样描述法国的情况：“首都成立了一个革命法庭，四五万个革命委员会分布于全国；嫌疑法摧毁了生命或自由的一切保障，把任何善良的好人交给任何恶劣的坏人，监狱胡乱吞吃了并未犯罪而申诉无门的人们。”“它使雄辩者沉默，使顽强者倒下，铲除美好和善良”。

　　作者还描写了一大群杀气腾腾的凶汉拿着带血的刀斧在一大块磨石上磨刀霍霍的情况，以及别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面。革命人民的形象被歪曲和丑化，被描写成毫无理性的疯狂的杀人恶魔，这充分表明了狄更斯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常他认为暴力革命只会使国家蒙受损失，破坏家庭和个人幸福。他极力渲染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借以警告英国统治阶级，企图用阶级调和来解决阶级矛盾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狄更斯出身于社会下层，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的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往往不是他所置于女主人公地位的那些贤淑的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而是各种类型的下层社会妇女，德伐日太太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应运而生的一个不同凡响的下层社会妇女形象。她的童年是很悲惨的，埃弗瑞蒙德使她的父亲、哥哥、姐姐和姐夫死于非命，家庭悲剧使她变得坚强起来。她沉着、机智、勇敢，她可以耐心等待复仇的时机，密切注视着周围一切动态，在复仇时机到来之前，她不停地编织，把她的仇恨、愿望以及她复仇的对象和贵族们的罪状都精确地编人了她的记忆。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她勇敢地站在最前列，成为圣安东尼区的妇女领袖。作者着重描述了她的“冷”和“阴险的黑眉毛”，连送信的修路人一见到她都浑身发抖。正如作者所说：“当时许多女人被时代所恶化，变为残忍可怕，但是还没有一个比此刻走在街上的这无情的女人更可怕了，自幼以来她就满怀着被凌辱践踏的意识和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机会一到她就变成母老虎了。她是绝对没有怜悯的，倘若她原来具有这种德性，那是早已被摧毁净尽的了。”如果从狄更斯的阶级感情分析，德伐日太太作为一个受压迫的下层妇女，应该作为正面人物出现。而且在她实现复仇计划后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结局。但作者却用大量笔墨去描写她的凶狠、可怕、冷酷无情以及为了复仇不惜殃及无辜的变态心理，最终她在读者中失去了同情。她的死使人感觉到这是她应有的下常在这一点上，狄更斯通过她反映了一种非人性的行为，体现的是残酷的复仇和暴力，通过她的结局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反对暴力的人道主义思想。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一马奈特大夫，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以马奈特大夫所处的社会位置来说，他并非处在阶级压迫的社会结构中最大的重力承受点，但他仍属于第三等级的平民，他的政治地位与德伐日太太等劳苦大众没有本质区别。由于职业的原因，他偶然目睹了封建贵族埃弗瑞蒙德兄弟践踏人格、草菅人命的暴行，因打抱不平他遭到了贵族的迫害。可是他出狱后不计旧恶，仅仅出国远遁，一走了之。他弄清了代尔那的身世，发现了代尔那与他的家仇后也能克制住感性的精神痛苦，化仇为爱，接受并认可了代尔那。他的见义勇为、克制忍让、踏实务实都是狄更斯理想的道德标准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在小说最后，他用两位着墨不多的人物来体现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两位是西德尼·卡屯和普若斯小姐。#p#分页标题#e#卡屯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律师助理。在他的身上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层神秘浪漫的悲剧色彩。他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怀才不遇，于是陷入彷徨迷茫之中。在外人看来，他不过是一个不修边幅、酗酒无度、落魄颠倒的人，但他的内心却是崇高而纯洁的。他用他的睿智在法庭上解救了达奈，最后又用貌似达奈的身体条件李代桃僵，打破了德伐日太太疯狂的复仇计划。他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己之所爱的幸福，在他人身上找到了自我。普若斯小姐在德伐日太太追杀露茜母女时与她偶然相遇，并促使德伐日太太丧命，从而使露茜母女得救。这两件事都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且也是一些评论家批评的焦点。他们认为这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的消极方面，主观地幻想用人类之爱和容忍妥协来解决阶级矛盾。但不能否认，偶然中蕴藏着必然，必然中也蕴藏着偶然。卡屯和普若斯的行为都有必然的动机一爱，二者都是纯洁无私的。这是以爱战胜恨，以自我牺牲求得人与人之问的和谐的典范。狄更斯由于生活的历史时代的限制，看不到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方式，在作品中宣扬的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他在同情被压迫劳动人民的同时，又反对人民进行暴力革命。这与他同时代的法国作家雨果的作品《九三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两位作家出色地描绘了人民起义的波澜壮阔的画面，都主张阶级调和，幻想以“爱”战胜“恨”，虽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但却是社会一个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狄更斯的人道主义，不仅仅局限于理论道德的范畴，还是他用来批判社会黑暗现实的武器。卡屯在I临刑前想到耶稣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是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还看到新的压迫者在旧的压迫者毁灭的废墟上兴起，而他们也很快就会在惩罚工具的手下消灭。经过反复的斗争、成功与失败，伟大的人民终将在深渊中升起，获得真正的自由。这表达了作者反对一种剥削制度替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的思想。总之，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把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彻底的利他主义，这是对资产阶级道德准则的一次有力的冲击。参考文献[1]薛鸿时．浪漫的现实主义一狄更斯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59[2]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2[3]朱维良，赵澧．外国文学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307[4]狄更斯／孙法理译．双城记[]．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5]张玲．剥笋一《双城记》主题分层析[J]．外国文学研究，1988，(2)：33—39．[6]王玉芝．从《双城记》看狄更斯思想的矛盾性[j]．外国文学研究，1997，(4)：41—45．